

美国对中东政治伊斯兰政策的演变 ——从卡特到老布什

刘云

(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政治伊斯兰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但与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相比, 对付政治伊斯兰的问题显然处于次要地位, 而且卡特、里根和老布什三任政府都试图利用伊斯兰力量制约苏联。老布什政府对阿尔及利亚选举进程的态度充分说明美国政府对政治伊斯兰力量的怀疑与不信任, 也说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 美国并没有出台对政治伊斯兰的明确而连续的政策。

[关键词] 美国政府; 政治伊斯兰; 中东; 政策

[中图分类号] D 870 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0)05-0054-06

美国在实施中东反恐战略和推动中东民主化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政治伊斯兰问题。如何在反恐斗争中明确划分恐怖主义与政治伊斯兰的界线? 如何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过程中避免伤害广大穆斯林的伊斯兰情感? 政治伊斯兰力量会对中东民主化进程产生何种影响? 这些问题是美国中东政策考虑中无法回避的因素, 也是研究美国中东关系时必不可少的环节。其实, 早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时, 美国政府就曾面对过这些问题, 并出台过相应的政策。本文的目的是探讨从卡特到老布什时期美国对中东政治伊斯兰的认识与政策变化, 从而发现美国对政治伊斯兰政策的初期形态与源流, 推动学术界对今日美国中东政策的理解。

一、卡特政府与伊朗伊斯兰革命

卡特任美国总统时, 中东伊斯兰运动处于上升时期, 但美国并没有公开地出台一种针对政治伊斯兰的系统看法和政策。美国的注意力集中于对苏联的冷战, 将苏联看成是最大的敌人, 而且情愿在与苏联的斗争中同伊斯兰主义者结盟。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卡特总统也是美国第一次遭遇伊斯兰运动, 由于没有前例可援, 卡特政府无法对新的伊斯兰主义潮流做出有效反应。这种情况对美国人认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产生了不利影响。伊

朗革命使美国损失了一个重要的依附国家。布热津斯基说: “伊朗国王的倒台对美国 and 卡特本人的政治生涯来说都是战略性的灾难。”^[1] (P398)

1978年, 伊朗革命风暴席卷全国, 伊朗国王的统治岌岌可危。在如何对待伊朗国王的问题上, 美国政府内早就有不同意见。革命发生之后, 不同观点之争更日趋剧烈。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强硬派, 由于害怕霍梅尼掌权后会对西方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强烈反对与霍梅尼对话。巴列维的官员将伊朗革命描绘成未开化的、粗陋的、狂热的、缺乏伊朗人民支持的一个转瞬即逝的失常事件。相当一部分美国高层官员对这一说法表示坚决支持。^[2] 布热津斯基认为伊朗国王的倒台将使伊拉克或其他亲苏力量在波斯湾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并导致中东地区的君主们对与美国的联盟产生怀疑, 危害到美国的利益。他还认为霍梅尼是对现存秩序公开提出挑战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1] (PP. 377- 378, 385, 394) 他认为伊朗的动乱是能够控制的, 主张不论伊朗国王采取什么措施, 美国都应该坚决支持。他热衷于用军事行动解决伊朗问题, 认为如果必要就进行军事接管。国务卿旺斯为代表的温和派认为伊朗的问题在于国王本身, 人民憎恨国王的统治, 主张美国应同革命者接触, 不管谁掌握伊朗政权都应准备好与之交往, 以确保美

[收稿日期] 2010-03-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中东关系中的伊斯兰教因素研究”(04CSS004)

[作者简介] 刘云(1966—), 男, 甘肃酒泉人, 历史学博士,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从事西亚北非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

国在伊朗的利益。他的观点得到国务院内一批官员的支持。驻德黑兰的美国大使威廉·苏利文倡导与伊朗军队和霍梅尼对话。苏利文称，这种对话会为签订一项新的政治协定铺平道路。^[3] (P237) 卡特总统左右摇摆，充当了一个极不果断的仲裁者，没能制订出有效的处理伊朗问题的对策。

巴列维倒台后，卡特政府也没有寻找机会与伊朗神职人员和解，而是躲开不熟悉的伊斯兰主义者，选择与受过西方教育的名义上负责临时政府的温和派接触。^[4] (P170) 直到1980年夏末美国官员才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受过西方教育的伊朗人身上转向了已经掌权的伊斯兰主义者。^[5] (P7) 但美国官员不信任毛拉们，也低估了他们的政治能量和号召力。卡特认为革命者是煽动反美狂热感情的“乌合之众”，霍梅尼的言论和行动更是“荒谬”。^[6] (P451, 453) 卡特的办公室主任汉密尔顿·乔丹说：“在伊朗我们正在应付疯狂的人”。^[7] (P39) 布热津斯基建议卡特采取重要步骤惩罚伊朗并迫使霍梅尼下台。卡特同意他的建议：“我要惩罚他们，真正地打击他们。”^[11] (P484)

伊朗国王倒台后，美伊关系恶化。1979年11月4日，伊朗学生占领美国使馆，扣押60多名外交人员作为人质。这一事件使美伊关系全面恶化。人质问题加深了美国的反穆斯林感情，美国政府官员充满了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愤怒。他们要求给霍梅尼施加最大压力迫使他释放人质。看到伊朗学生在白宫前游行支持伊朗革命时，卡特总统说：“我不会让那些坏蛋在白宫前面侮辱我们的国家！如果我不是总统，我将到街上揍那些支持霍梅尼的游行者的。”^[7] (P40) 他还命令驱逐签证到期的伊朗学生。美国外交官表示，霍梅尼如果没有安排也至少鼓动了学生夺取美国大使馆和扣押美国人质的行为，其目的是对内巩固他的伊斯兰革命，对外在政治上得分。美国对伊朗问题的误读，其核心在于美国很深的文化偏见。美国官员认为霍梅尼号召建立的伊斯兰国家是“荒谬”的，它与西方传统的世俗化革命的全部历史相反。卡特政府官员的文化偏见是“如此顽固以至于从根本上妨碍了观察和分析的正常过程。”^[8] (P166) 霍梅尼建立了伊斯兰政府以后，卡特政府的政策判断被固有的文化偏见左右着，他们相信“在德黑兰的霍梅尼政体是外国的极端事物”，具有“疯狂和荒谬”的特性，必定会走向自我毁灭。^[8] (PP. 167-168)

政府核心决策人物意见的不统一影响到政府部

门的各个层次。美国在伊朗革命期间所做的决定多数是应急的。每一决定的出笼都受到两派人物在政府里的活动能力、伊朗当时发生的事件以及偶然出现的时机的左右。在更深层次上，卡特政府尤其担心伊斯兰革命会对毗邻的海湾国家产生影响。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安全和战略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但文化问题间接地损害了许多美国官员的判断。卡特总统要求他的办公室主任汉密尔顿·乔丹停止“谈论文化的差异和霍梅尼的荒唐”，而更主要地考虑伊朗行为固有的严重战略后果。^[7] (P66)

伊斯兰革命对美国在中东的安全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于1979年11月夺取了麦加大清真寺，震惊了整个穆斯林世界。随后，美国在巴基斯坦、利比亚、科威特、阿富汗的外交官受到袭击，大使馆被焚烧。伊朗的挑衅对以后美国对伊朗、波斯湾国家和其他伊斯兰运动的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著名中东问题专家希里恩·亨特 (Shireen Hunter) 说，美国不仅要打败霍梅尼，从而对其他穆斯林国家证明伊斯兰革命的破产，而且要在没有将伊朗推入苏联的怀抱和不引起伊朗分裂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壮举。^[9] (PP. 59-60)

但在这个阶段，美苏竞争占据主导地位，其重要性超过了包括革命伊斯兰在内的第三世界问题。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进一步使美国决策者认识到，比起伊斯兰主义者的挑战，与苏联的战略冲突应居于更重要的地位。卡特称，苏联侵略阿富汗是“自从我当总统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国际事件。”^[6] (P473) “苏联行为意味着它造成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和平最严重的威胁。”^[10] (PP. 194-196) 而且，卡特政府要借助伊朗“占统治地位的原教旨主义教士”的反苏情感动员伊斯兰教抵抗苏联。布热津斯基说，为了遏制苏联，必须避免使反苏的伊斯兰主义者发生分裂的任何事情，尤其是要避免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现在铸造一个反苏维埃伊斯兰联盟似乎对我更重要。”^[11] (P489) 早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已经开始了对阿反政府武装的支持。1979年7月3日，卡特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中情局在阿富汗支持反政府武装，许多中情局的人员为游击队提供了军事训练；同时，卡特还同意设立一项总统基金，专门用来武装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这项资金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政府送到游击队手中。^[11]

卡特政府的官员们认为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合作

是可能的，希望利用其思想和物质上的资源对付苏联的扩张。但卡特政府并没有一个对政治伊斯兰完整的政策。对美国官员来说，伊斯兰复兴是冷战中出现的一件暂时的烦恼之事。美国的外交政策继续围绕着遏制苏联而不是政治伊斯兰这个轴心运转。

不过，伊斯兰革命和人质危机对美国人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总体理解有破坏性的负面影响。在美国眼中，伊斯兰伊朗威胁了美国及其中东盟友的地区性利益的稳定和安全。在美国人心目中，革命伊斯兰、恐怖主义和颠覆活动的升级是相关联的。卡特政府不仅没有帮助伊朗国王保住王位，而且自身的利益也遭到损害。美国在波斯湾的主要“支柱”坍塌了。这无论对美国的中东政策还是对该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二、里根政府对政治伊斯兰的言论与政策

里根当政时，美国在中东地区有三种基本利益：遏制苏联南下渗透、保证海湾石油通道的畅通无阻、保护以色列的安全。里根就是围绕着这三个基本点来制订其中东政策的。为了更有效地遏制苏联，里根政府加强同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联系，以它们为主形成一道包括约旦、阿曼、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国在内的“战略一致”抗苏防线，在“战略一致”的旗帜下，使这些国家结成广泛的抗苏联盟。1986年3月15日，里根向国会提交了一篇关于处理地区性冲突的咨文，被称为“里根主义”。“里根主义”的重点在于以“外交冷淡”、“经济制裁”、甚至直接诉诸武力等手段打击亲苏国家；对于亲美国家，则以外交和经济手段加以笼络。在中东地区，里根政府加强与亲美国家的关系，打击同苏联关系密切的阿拉伯国家，削弱阿拉伯世界的激进势力，减少苏联的影响。

里根政府对政治伊斯兰的政策，自然会围绕美国中东战略而制定。比起卡特政府来，里根政府对政治伊斯兰的声明更为强硬。国务卿舒尔茨将政治伊斯兰等同于激进的极端主义。国防部部长温伯格把伊朗什叶派说成是“最狂热和基本最反西方的穆斯林派别。”^[12]（P137）在许多场合，里根本人在提到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时使用了敌对的语言。1980年选举后，他声称穆斯林正在恢复他们的一种信仰，即只有杀死了一个基督教徒或一个犹太人，才会去天堂。^[13]（P37）1982年以色列侵略黎巴嫩之后，引起了广大阿拉伯国家的不满。美国提

出了解决巴以问题的“里根方案”，试图通过巴以问题的解决来缓和阿拉伯世界的反美与对抗以色列的浪潮；同时让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参加阿以和平进程，以遏制原教旨主义者在中东地区进一步活跃。但阿以双方都没有接受里根方案。1986年上半年，美国以利比亚支持恐怖主义为由，两次空袭利比亚。在轰炸利比亚的声明中，里根总统把卡扎菲称为“野蛮人”，声称利比亚恐怖主义是世界范围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14]（PP. 347-354）

里根政府的敌对态度反映了新总统的思想风格，也反映出美国与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在增加。然而，里根政府官员言辞的尖锐化并不代表美国外交政策有了新变化。里根仍将苏联及其在本地区的代理人，而不是伊斯兰主义者看成是真正的敌人。在里根领导下，美国政府仍然继续支持保守宗教因素对抗苏联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力量。1986年上半年美国向阿富汗抗苏游击队首次提供几百枚毒刺导弹，有力地支持了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对苏军的战斗。里根的行动加强了在穆斯林游击队联盟内最为“好战的伊斯兰组织”。^[15]（PP. 279-280）里根政府将对苏联的遏制放在了优先地位，他经常重申他对联合抵抗苏联的穆斯林游击队“自由战士”的支持，并加大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穆斯林游击队提供援助的力度，每年平均向游击队提供6亿美元的援助。^[11]

里根对阿富汗伊斯兰游击队各派的支持同样应该放在冷战的环境中进行分析。美国与伊斯兰国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结盟，并支持阿富汗的穆斯林游击队，对抗苏联及其在第三世界的代理人。里根政府甚至希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转变立场对抗苏联。伊朗门事件（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来换取在黎巴嫩释放美国人质）说明里根政府愿意与伊朗交往，并且把它看作是遏制苏联的天然联盟。^[15]（P284）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武装伊朗，阻止美国伊朗关系的恶化，将正在上升的伊斯兰复兴力量拉到西方一边。里根政府的一些官员担心，如果伊朗伊斯兰政府是不稳定的，那么伊朗就会是苏联进攻的一个脆弱目标。

伊朗门事件的公开暴露使里根感到难堪，他不得不接受国务院的建议，在两伊战争中支持巴格达，美国伊朗关系进一步恶化了。1988年7月，一架伊朗民航飞机被美国军舰击落，双边关系降到最低点，1988年11月，里根恢复了对伊朗的经济

禁运令。与卡特政府一样，里根政府的官员们在很长时间内都认为不可能与德黑兰建立正常关系。^[12] (P354) 里根的态度使伊朗成为美国新的敌人。美国官员对伊斯兰政治的理解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发生了变化。苏联 20 世纪 80 年代末已经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与美国作对，而美国又需要一个对手，结果美国政策上层发现伊朗是一个方便的目标。美国外交政策不再围绕遏制苏联而运转。美国政府对政治伊斯兰的态度与美苏关系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尽管里根政府官员经常在言论上否定政治伊斯兰，但他们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从没有清晰地制定过任何政策。他们没有将伊斯兰主义者看成是对国际秩序稳定的一种统一和现实的威胁。

三、布什与阿尔及利亚危机

1989 年布什总统上任时，伊斯兰运动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扩散。加上苏联的崩溃和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出现，伊斯兰复兴运动成为美国中东外交政策首要考虑的问题。

美国一直在对外政策中倡导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布什政府官员特别关心埃及、突尼斯、约旦等国的伊斯兰主义者在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但中东的民主化进程并不总是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尤其是中东的各种伊斯兰力量参加到政治民主化进程之中时，情况更是如此。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显然是将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美国对 1992 年阿尔及利亚军事政变的态度，充分说明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化的困境。如果伊斯兰主义者通过民主程序上台执政，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宁可选择维护中东的独裁政权。

1991 年 12 月，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以下简称伊拯）在国会第一轮选举中取得了令人吃惊的胜利，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第二轮选举，从而走上执政地位，这使美国大为震惊。此时，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一直实际掌控局势的军方对政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军方为了阻止产生“伊斯兰独裁政权”，在第二轮议会选举前，逼迫已经声明接受第一阶段选举结果的沙德利总统辞职，建立了“最高国务委员会”临时领导机制，进而取消了第二轮选举。这一系列举措使伊拯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愿望化为泡影。伊拯称沙德利的辞职是军方策划的一次反对伊斯兰政权的政变，号召支持者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取消第二轮议会选举。1992 年 2 月 9 日，军方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禁止伊拯公开活动，并开始大规模逮捕其成员。3 月 4 日，伊拯被取缔。阿尔及利亚卷入持续不断的流血内战之中。面对这种情况，布什政府必须对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者做出明确的姿态。美国政府需要证明其政治多元化主张是真实不虚的，并适用于伊斯兰世界。

阿尔及利亚军方的行动，实际上得到了美国的默认和支持。美国担心伊拯上台执政，会产生“多米诺效应”，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有可能在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国掀起新的夺权浪潮，将对这些国家的世俗政权形成挑战。开始，美国国务院对取消选举进程感到遗憾，表示希望要找到一个方法恢复民主进程。但是并没有批评军队夺取政权，这是对军事政变的无声赞同。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与 20 世纪 90 年代土耳其的情况非常相似，这加强了许多穆斯林坚持的关于美国并不认真对待中东民主化的看法。^[16] 尽管布什政府后来提出中立，但它仍然不相信伊拯具有民主能力。其他美国外交官也表示，阿尔及利亚伊斯兰主义者的胜利会产生反西方的效果，并会在周边国家引起连锁反应。

布什政府官员特别担心政治伊斯兰会进军整个非洲。阿尔及利亚的选举增强了他们的这种担心，他们认为伊斯兰政府反感世俗政治和西方文化，会在共产主义倒塌以后对西方提出新挑战。^[17] 在这种意义上，美国对政治伊斯兰的理解与冷战的结束有关，并与苏联崩溃后留下的战略空白有关。在冷战时代，美国集中精力与苏联抗争；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又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一些“小魔鬼”。美国领导人与其智囊团开始思考代替苏联成为全球性敌人的政治伊斯兰的问题，美国要制定针对政治伊斯兰的新战略。1990 年，副总统丹·奎勒将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与共产主义的兴起、纳粹的兴起直接联系起来。^[18] (P70) 另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也说，共产主义死亡了，“伊斯兰教在全球成了它的替代物。”^[19]

在这种考虑下，我们看到了布什政府对阿尔及利亚危机的最初反应。国务卿詹姆士·贝克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愿意忍受阿尔及利亚的选举结果，因为美国政府认为伊拯属于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它与“西方是真正对立的，与民主的价值观、自由市场原则是对立的。”^[20] 布什政府对颠覆阿尔及利亚民主进程的军事行动视而不见并不奇怪。根据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的说法，布什政府害怕“阿尔及利亚会走伊朗的道路。”其他美

国官员说，布什政府对阿尔及利亚危机的反应受到了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恐惧的影响，“阿尔及利亚危机爆发时，伊朗的阴影正笼罩在美国决策者的心头”，美国也担心阿尔及利亚伊斯兰主义者对阿以和平进程的潜在的负面影响，担心它对埃及和北非国家产生影响。^[18] (P77)

这种现实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海湾战争以后布什政府对伊拉克什叶派的态度，当时，它允许伊拉克政府破坏什叶派起义以免它扩充伊斯兰伊朗的力量。美国政府也试图建立新联盟限制伊朗影响，开始加强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亲西方国家的力量。1992年国务卿贝克到中亚国家访问时，主张中亚国家仿效世俗的土耳其而非伊斯兰教的伊朗。他公开宣称穆斯林占大多数人口的中亚国家，同美国有“更多共同价值观，拥有共同未来。”^[21]

美国的安全和战略考虑建立在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怀疑之上。美国官员似乎将伊斯兰政治看成是类似历史上有其根源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因为美国要维护国际社会的现状，就不容忍革命对国际秩序的挑战。通过支持阿尔及利亚军事政变，美国政策制定者选择了稳定而不是民主试验。比起未经历过的、也不熟悉的伊斯兰主义者来，选择阿尔及利亚的将军们是一种更安全的投机。

担任国务卿近东事务助理的爱德华·杰瑞吉安于1992年6月在华盛顿的一家非政府机构梅里迪安国际中心进行了一次演讲，这是美国政府在伊斯兰主义问题上第一次全面阐述其主张，标志着布什政府对政治伊斯兰特别是对阿尔及利亚立场的微妙但重要的变化。这次演讲为以后政府发表对伊斯兰主义的讲话奠定了基调，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布什政府在伊斯兰主义与民主问题上的矛盾心态。梅里

迪安演讲标志着美国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开始变得积极而灵活。阿尔及利亚的安全状况恶化后，军队无力镇压伊斯兰主义者，布什政府认可了阿尔及利亚经济政治改革，要求依法律程序处理被逮捕的人。梅里迪安演讲对美国支持取消阿尔及利亚选举进程进行辩护，认为美国的行为是正当的。

杰瑞吉安坚决主张，“美国政府不把伊斯兰教看作是对抗西方或威胁世界和平的下一个‘主义’”，“伊斯兰教是影响和丰富了我们文化的一种历史性的文明力量。”^[22] 他还说，各种伊斯兰主义运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不确定性，“这些运动后面并不存在整体的国际努力。”杰瑞吉安对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了区别，谴责伊朗、苏丹赞助和利用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整个中东散布恐怖主义。同时，杰瑞吉安认为中东社会经济和政治挫折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的前提。他强调，“宗教在我们与其他国家关系中本质上或实质上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既不是肯定因素也不是否定因素。”^[23] 他提到美国与许多中东国家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深植于伊斯兰原则之中。从梅里迪安演讲仍然不能看出布什政府是否真正地在伊斯兰主义者赢得权力的情况下，会支持民主化进程。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极端主义不论是世俗的或宗教的，都会被定义为美国的敌人。

美国对政治伊斯兰的政策事实上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美国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促使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沙特政府扩大政治基础。美国中东政策中占优先地位的仍然是安全问题，而不是中东的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化问题。

[参考文献]

- | | | | |
|--------|---|--|--|
| [1] | Zbigniew Brzezinski, <i>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i> ,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3. | | |
| [2] | James A. Bill, <i>The Eagle and the Lion</i>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 |
| [3] | Barry Rubin, <i>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i>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 |
| [4] | Robin Wright, <i>Sacred Rage: The Wrath of Militant Islam</i> ,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5. | | |
| [5] | Warren Christopher, ed., <i>American Hostages in Iran: The Conduct of a Crisis</i>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 |
| [6] | Jimmy Carter, <i>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i>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2. | | |
| [7] | Hamilton Jordan, <i>Crisis: the Last Year of the Carter Presidency</i> ,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2. | | |
| [8] | Gary Sick, <i>All Fall Down: America's Fateful Encounter With Iran</i> , London: I. B. Tauris, 1985. | | |
| [9] | Shireen Hunter, <i>Iran and the world</i>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 |
| [10] |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U. | | |

-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l. 16, No. 4, 28 January 1980.
- [11] Soviet war in Afghanistan,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viet_war_in_Afghanistan#cite_note-The_CIA-19.
- [12] Caspar Weinberger, *Fighting for Peace: Seven Critical Years in the Pentagon*,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0.
- [13] An Interview with Ronald Reagan, *Times*, 17 November 1980.
- [14] Reagan Address on U. S. Air Strike against Libya, 14 April 1986, in *Historic Documents of 1986*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87).
- [15] Nikki Keddie and Mark Gasiorowski, eds., *Neither East Nor West: Ir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6] 刘云. 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轨迹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1).
- [17] Barbara Crossette, “ U. S. Aide Calls Muslim Militants Big Concern in World,” *New York Times*, 1 January 1992.
- [18] Fawaza A. Gerges, *America and Political Islam: Clash of Culture or Clash of Interes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9] John Esposito, “ Symposium: Resurgent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http://www.danielpipes.org/950/symposium-resurgent-islam-in-the-middle-east>.
- [20] Interview with James A. Baker III, *Middle East Quarterly* 1, No. 3, September 1994, p83.
- [21] Thomas L. Friedman, *Republics Promise to Protect Rights*, *New York Times*, 13 February 1992.
- [22] The U. S., *Islam and the Middle East in a Changing Word*,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2 June 1992.
- [23] Gene Bird,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Assures Middle East the ‘ Crusades Are Over,’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11, No. 2 (July 1992), p29.

The Evolution of U. S. Policy to Political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Carter to Bush Sr.

LIU Yu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421004, PRC)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Islam has greatly influenced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global strategy for constraining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dealing with the issue of political Islam was clearly a secondary consideration of the U. S. government. Furthermore, Carter, Reaga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 had attempted to use Islamic forces to constraint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attitude toward the election process in Algeria, fully demonstrated the suspicion and mistrust of U. S. to political Islam, and also the Islamic Revolution of Iran has effected the Middle East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profoundly. However, during that period,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issue a clear and continuous policy toward political Islam.

[Key words] the U. S. government; political Islam; policy

(责任编辑 胡小鹏/ 校对 古跃)